

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一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蔡 坚 / 主译

康学坤 朱士兰 吴 莎 / 译



1590年—18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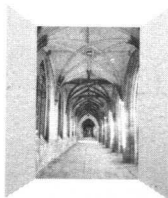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一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蔡 坚 / 主译
康学坤 朱士兰 吴 莎 / 译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590年—1820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6-324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1

Edited by Sacvan Bercovit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本书全球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1卷/ (美) 伯克维奇 (Bercovitch, S.) 主编;
蔡坚主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211-567-5

I. 剑…

II. ①伯…②蔡…

III. 文学史—美国

IV. I712.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0406 号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1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 m a i 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970 千字

印 张: 54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简介

这部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它收录了一代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文学历史学家们勾勒了美国文学的轮廓并重新定义了美国文学的各个发展阶段。美国文学史研究的快速发展需要一个更为广泛而灵活的学术框架，本套书满足了这种需求。此前出版的所有美国文学史，要么因为提供了权威单一视角的看法而显得极端，要么百科全书般地列举了大量简洁的叙述，其结果似乎也是同样的极端，因为形式本身妨碍了作者阐述自己的看法。这部美国文学史通过多视角、大量的叙述逐步展开，其中每一个叙述涉及范围之广泛、细节之丰富足以详尽阐述那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前提、论点和分析）；每一个叙述都因有实证而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而且所有叙述之间都通过共同的主题和关注的问题而相互关联。

我们之所以选择书中的诸位学者来撰写这部书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卓越的学识，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著作的高度评价。这套书的作者们共同展示了在过去30多年中美国文学评论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不仅证明了几代学者研究之间的断裂，而且证明了文学研究的传承性，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相关的大量的资料。

本卷内容涵盖了美国文学从殖民地时期直至建国初期出现的各个阶层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其中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探险者、清教神权统治者、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作家、南方女性作家、革命时期宣传册撰写者、年轻合众国的诗人和小说家，等等。迈拉·杰琳利用新世界的探索和殖民时期多语种的文学材料，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的形成及这一帝国扩张的过程。埃默里·艾略特追述了从难以治理的开始直至动荡的18世纪中期复兴阶段的新英格兰文学方式及其发展中冲突迭起的一段历史。戴维·S. 谢尔德的研究侧重点虽然在时间跨度上并不大，但所包含的内容却极其丰富，其中有大量新近发现的书信、诗集和散文集。这些包罗万象的珍贵作品和资料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从费城、纽约一直到南方旧时社会沙龙中普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的纯文学风格。罗伯特·A. 佛格森深入研究了构成美国文学启蒙时期的特点，以及



后来为整个国家修辞风格奠定了基础的各种篇章模式，并且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迈克尔·T. 吉尔默在详细叙述一个国家文学传统产生的过程中，描述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从共和国到自由市场理念，从口头文化到印刷文化，从集体主义价值观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转变。

本书的五位作者都将文学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考察和研究。同时，不论他们的侧重点是殖民地时期的文学，还是某一地区或是全国范围的文学，这五位学者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究了美国文学中的“美国特点”，即在“美国化”过程中文学和语言的向心性特点。他们又一次令人信服地全面展现了文学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并确立了美国早期文学的历史价值。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



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 and 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5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



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 谢

总编致谢：

感谢哈佛大学召集本书的各位作者进行为期三天的研讨和规划。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和朱丽·格林布莱特所给予我的慷慨帮助。感谢丹尼尔·艾伦、伊曼·伯科维奇和苏珊·L. 密祖鲁奇一直以来给我的支持和建议；并感谢南茜·宾利、迈克尔·贝托尔德、列娜·法伯和杰西卡·里斯金等同学所做的文案校对工作。我尤其要衷心地感谢玛格丽特·瑞德女士在本书撰写的各个阶段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并感谢她为本书所做的索引工作。

萨克文·伯科维奇

殖民地时期的文学

我谨在此向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负责人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这个项目开始时批准了我一年的假期。在这段时间内，达特茅斯学院热情地向我提供了帮助，并准许我使用他们一流的贝克尔图书馆。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给予我的另外一学期的假期。感谢纽百利图书馆的地图管理员小罗伯特·W. 凯洛先生给予我的宝贵帮助，是他为我选择了两幅美国地图作为文中的插图。同时感谢纽百利图书馆慷慨地允许我复印那两幅地图。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帝国时期的文献”引自欧文·R. 布莱克编纂的《哈克鲁特航行记》一书中的前言部分。文中第五章出现的对一些欧洲文献的翻译以及该章节的标题，都引自安东尼洛·戈比的权威性译著《新世界的争端——一部辩论家的历史》一书。最后，我要向为我提供了宝贵建议的帕特里西亚·M. 斯帕克斯、迈克尔·华纳、艾米丽·巴特尔斯、玛丽林·杨和杰西卡·里斯金等人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向本书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表示衷心的感谢。

迈拉·杰琳



新英格兰清教文学

感谢以下机构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的经济帮助：人文科学国家援助基金会（NEH）、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第一章初稿曾提交给维罗纳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研讨会，因此，我谨在此感谢为我提供慷慨帮助的伊塔拉·维凡教授、皮埃尔·伊弗斯·派提朗、维欧拉·萨克斯教授、多米尼克·马凯斯、加宁·德芙和马克·莎那迪艾。感谢欧文人文学研究所主任马克·罗斯先生及研究所的全体成员。1991至1992年间“少数民族语篇课题组”悉心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为此，我对以下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诺玛·阿拉尔贡、裘斯·艾玛雅、文森特·程、金考·程、金伯利·柯蓝肖、安妮·丹尼伯格、阿布杜拉·睿默罕默德、梅·约瑟夫、克莱拉·苏·克德威尔、司马达·拉维、弗朗索瓦·莱昂奈特、刘海铭、丽莎·洛、丽莉安·曼泽卡斯、迈克尔·斯普林克、斯特林·斯塔基、戴维·凡·列尔、克莱伦斯·沃克。感谢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以下同事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我的书稿，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史蒂夫·阿克叟洛德、卡洛·本西克、马克·艾略特、布鲁斯·哈古德、德博拉·哈思维、卡拉·玛吉尔、卡尔顿·史密斯。同时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克拉裘里奥和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伯纳德·罗森塔尔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海瑟·达布罗给我的宝贵建议。尽管在写作过程中，诸多学者的著作都帮助了我深入理解新英格兰清教文学，但我尤其要对以下学者表示感谢，他们的著作给了我很大启发：伯纳德·拜琳，萨克文·伯科维奇、米歇尔·布列特维泽、迈克尔·克拉克、帕迪·克威尔、罗伯特·达利、爱德华·戴维森、安德鲁·戴本考、约翰·戴默斯、艾弗莱特·爱默生、文迪·马丁、哈里森·梅瑟罗尔、罗伯特·梅德考夫，佩利·米勒、凯伦·罗尔、吉恩·法莱萨达、丹尼尔·谢、肯尼斯·西尔佛曼、艾尔登·T. 弗冈、拉泽尔·西夫。感谢我的朋友、同事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教师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感谢1988年国家援助基金会夏季研讨会的成员们对我的鼓励。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和朱丽·格林布拉特以及曾在那里任职的伊丽莎白·玛奎尔都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耐心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同样感谢本书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和副主编赛露斯·帕特尔，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所提出的建议。感谢我的妻子乔治亚对我一如既往的情感和精神支持；也对我的孩子们——斯科特、马克、马修、康斯坦斯和劳拉给我的支持表示感谢：在我因为醉心于另外一个时空的人和事而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时候，他们



给予了足够的宽容和理解。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纯文学

尽管我已在这部分最后一个段落中，对启发和帮助我写作文学史的学者及其著作表达了谢意，但我必须承认，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帮助。例如，我对“文学作品中对话描写模式”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于尔根·哈贝玛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一书中有关俱乐部、咖啡馆方面见解的启发。同样，彼得·克拉克关于社交能力的著作，劳伦斯·克莱恩关于礼貌风格的研究，以及理查德·布施曼在社会交往中有关斯文和教养的论述，都为我在纯文学的社会愉悦功能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努力方向。文中关于殖民地时期美国女性写作和言语机制的分析得到了德娜·古德曼在法国沙龙文化方面研究的极大帮助。另外，帕蒂·克威尔和卡拉·穆尔福德两位学者对于殖民地时期女性写作规律的开创性研究，也为这一领域中任何其他深入的探索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我对殖民地时期美国文学的最初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威廉·斯班戈曼的研究著作。

作为美国古文物协会的塞缪尔·福斯特·黑文研究员，我在手稿的传播及印刷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而在本书所提出的最新研究成果应被视为在戴维·D. 豪尔和迈克尔·华纳义务论史方面的一种练习。

正是由于得到了国家援助基金会夏季研究项目的资助，才使我能够对刘易斯·莫里斯二世（II）和罗伯特·波林进行档案考察工作。对阿奇伯德·豪姆作品和生平的研究得到了美国哲学学会的项目资助。西塔德尔发展基金会为关于伊丽莎白·格莱姆·佛格森、詹姆斯·科克帕特里克和乔治·奥吉尔维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差旅经费。

感谢罗伯特·佛格森、J. A. 勒梅、威尔逊·萨摩威尔、菲利普·古拉和凯希·戴维森阅读了本项研究的文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尤其感谢卡拉·穆尔福德提出的真诚的批评意见。

感谢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允许我引用亨利·布鲁克的《杰斯汀语篇》和《变形新考》两部书稿。它们摘自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彼得收藏的《札记》一书。

ix 感谢大英图书馆管理方允许我节选馆藏的《托马斯·沃达克船长 1710 年 11 月 12 日写给詹姆士·佩迪弗的信件》。

感谢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允许我节选并复印曾任英王秘书及北美新泽西州



事务顾问的阿奇伯德·豪姆爵士的《在各种场合的诗作》一书。

感谢罗伯特·米克鲁斯准许我对其所编辑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古老的光荣星期二俱乐部的历史》一书第三卷的多处引用。

感谢拉特格斯大学档案馆特殊藏品和档案处允许我复印罗伯特·莫里斯的《散文与韵文》一书中的刘易斯·莫里斯政治诗作的部分内容。

感谢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允许我在文中使用约瑟夫·格林于1733年6月7日写给本杰明·保拉德船长的信。

感谢亨廷顿图书馆允许我使用罗伯特·波林的《拥堵》合集。

感谢费城图书馆公司允许我复印伊丽莎白·格雷姆的《一位年轻女士的作答歌》一书中的《朱薇丽亚诗集》的手稿。

感谢帕蒂·克威尔允许我多处引用苏珊娜·莱特写给伊丽莎白·诺里斯的诗体信件《女性呼唤理性的援助》一文。

感谢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允许我引用苏珊娜·莱特的《1726年……所作诗篇》一文。

感谢卡拉·穆尔福德允许我引用其即将面世的《安妮斯·伯迪诺·斯道克敦诗作》一书中“致来访者”一文。

戴维·S. 谢尔德

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

由于这部分文学史用现在时的语气写成，因此我首先请求读者们特别关注历史这个问题本身。史学家们常常用“现代主义”一词来批评那种企图用当代标准来评判历史的错误倾向。由于现今普遍存在着这种倾向，所以我认为这种批评和警告十分必要。但本人在书中所采用的现在时态却表明了另外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即不论那种错误倾向多么危险，将现在的情况强加于历史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因此，有必要让我同读者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记录本身的局限性。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按照当时的普遍看法对美国革命史进行解读上的篡改，这就意味着美国革命史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但未必真实准确的文化遗产。但如果我们的革命史在每一代史学家解读时都有所不同的话，史学家们——即便是文学史学者们——也免不了要陷入困惑的思考。这种必然会导致著作与历史真实相悖的危险，可能迫使读者和历史书写者们都回过头来再次审视原始史料所具有的真实与善变的双重属性。这样看来，我在书中使用现在时进行叙述既可以提醒读者注意在组织、安排和利用史料时可能对历史



原貌造成的偏差，同时也表明笔者正在力求还原历史原貌的这种矛盾心理。

文学史的写作尤其需要栩栩如生的现代感。这种生动的效果蕴含于迄今尚存的文本中。因此，我在文中试图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来展示革命时期的文献本身所蕴含的激情。而正是当时纷繁、动荡的社会和瞬息万变的局势，才使得这些文献中的语言一反当时盛行的晦涩之风，而带有革命时期特有的热情与奔放。所以，那些目前看来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下的包括布道、宣传册和公共文献等体裁的文本，都不应被看做当时僵化的语篇模式，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们是在当时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产生的生动的文化表现形式。

我们如何才能了解美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呢？首先，我们能利用那些参与过或见证过那段历史的人所留给我们的作品、相关文献或者其他物证来进行判断；其次，我们可以参考当时和后来与那段革命相关的所谓史实；再次，我们可以研究和对比历来对那段历史时期及当时相关思潮的各种解读；最后，我们还可以借助所谓“思想史”来进行推测。和其他任何历史学者一样，我在研究和写作中也力求合理地、综合地利用以上四种方法及以前人们使用过的各种方法。为此，我在这部分最后的参考书目中已经表达了我对前辈们的谢意。同时，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尽管难度很大，但我仍然力求将过于复杂的各种史料进行必要的简化叙述。历史永远比我们所能了解的更为复杂。每个历史事件下面都会隐藏着能最直接反映真相的史料。而对于这些史料的每一点新的发现，都会帮助我们在目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决定从几个不同的认识角度来解决这些困难。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这一现象，这种情况为重新研究美国各民族起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另外，那个时期书面或演讲形式的作品本身在修辞上说比多数人想象的要更为丰富和复杂。对于如何阅读美国革命时期的作品，我相信我们尚处在学习阶段，而且由于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辩证地看待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详细地研读这一时期的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该说，这种对文本认真研读的态度是这个国家的福气：整个联邦国家诞生的那个时刻，正是美国人开始真正认真对待各种流派和思想的时候，而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总是这样。如果我这部分文稿能将所叙述的任何一种思想清楚地呈现于读者，供大家质询和讨论，那么我的研究就已经实现了它最重要的价值。

在众多对我提供帮助的学者当中，五位学者的慷慨相助贯穿了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始终。安·道格拉斯和理查德·波斯纳阅读了我的部分手稿，并作出了评论。我亲密的合作者迈克尔·T·吉尔默常常向我提出宝贵的建议。约翰·保罗·罗叟和普里西拉·帕克赫斯特·佛格森对文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止一遍地进行了校对。尽管他们各自所提供的帮助相对独立，但他们共同为我



提供了一个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团队。

本项目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曾有机会见诸文字，我因此而受益匪浅，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使这些想法趋于完善。为此，我对帮助我出版以下文章的编辑和出版商表示感谢：《“我们坚信这些真理”：国父文献中的控制策略》（载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重建美国文学史》）；《意识形态与宪法的构建》（载《早期美国文学史》22，1987年秋；第157—165页）；《“我们规定并确立”——作为文学作品的宪法》（载《威廉与玛丽的法律观察》1987年秋，第3—25页；以及《“什么是启蒙运动？”——一些美国式的答案》（载《美国文学史1》，1989年夏，第245—272页）。

罗伯特·A. 佛格森

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文学

我为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美国革命时期到19世纪20年代之间美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文主义的兴衰。我之所以着眼于这一时期，是因为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将共和国时期看做是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起始期，但同时19世纪逐渐成型的自由浪漫的气质。在众多对我的著述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学者当中，我要特别感谢戈登·伍德、J. G. A. 博科克、威廉·查凡特、凯希·戴维森、迈克尔·华纳和伯纳迪克特·安德森。诸多英美学者们在小说的起源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对我理解美国早期文学提供了很大帮助。除了戴维森的著作以外，我还要感谢莱昂纳德·戴维森、南茜·阿姆斯特朗和迈克尔·麦肯昂等几位学者。其他众多对我的写作提供帮助的学者及其作品，我在参考书目中已一一列举并致谢。读者们会发现，我的观点往往不同于在我之前的学者，但没有他们先前所做出的研究，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部分的写作的。

这部分的写作经历了很长时间。期间有众多的学者为我提供了帮助。萨克文·伯科维奇和罗伯特·佛格森通读了我的手稿，是他们宝贵的修改意见帮助本章最终定稿。以前在布兰德斯大学的两位同事艾伦·格罗斯曼和安妮·查诺维兹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和修改意见。一些章节的写作还受益于以下学者的宝贵建议：西西里亚·蒂奇、肯尼斯·西尔弗曼、艾米·朗、唐纳德·皮斯、罗伯特·格罗斯、布鲁克·托马斯，埃维·施威泽、文弗莱德·弗拉克、安德鲁·戴尔班科、尤金·古德哈特和迈克尔·麦肯昂。我现在和过去的研究生对我对文献的最初解读提出过挑战，并使之日臻完善，在他们面前，我不敢有丝毫马虎。他们主要是史蒂夫·哈梅尔曼、吉姆·凯、尤特·格洛尼格、马



克·伍德沃斯、金·汉密尔顿和格兰特·赖斯。我非常感激所有这些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如果我的文章中出现了史实或判断方面的错误，都与他们无关。

感谢美国学术委员会 1987 年至 1988 年间的项目资助，使我完成了文章的初稿。

感谢我的妻子德布拉·瓦伦兹。她在我写作的几年中，从情感和写作两方面对我都提供了理解和帮助。她同我一起经历了写作过程中的愉悦与困境，并仔细阅读了我所写的每一个字。她的严谨与智慧使得此书更加清晰易懂，她的爱也使我的精神更加灵活与丰富。至于我的两个小女儿——艾玛和罗莎，与她们获得的满足感相比，我的写作给她们带来的不愉快要大得多。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因外出实地考察而时常不能陪在她们的身边。她们的爱维系和支撑着我完成了这部书稿。

我刚完成本书的修改，就得知我的父亲得了晚期癌症。他在死亡面前的勇气和对生命的信念是令人难忘的。我把《剑桥美国文学史》的这一部分当成对他的怀念。

序 言

这部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有助于介绍英文写作的一个新的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 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主持下编纂而成的《美国文学史》帮助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化学者的工作,他们重新划定了这一领域的界线,并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时期进行了重新定义。本书的作者们大都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教育和积累阶段,而且其研究范围包含了目前美国文学各分支领域当中所有新兴的和已经成型了的研究方向。这些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们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着的工作为当代文学界的主要研究领域勾勒出了清晰的轮廓。

过去的30年间,美国历史文学批评已经从一个边缘学科发展到了人文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论是在高中、大学还是研究生课程中,甚至在一些出版物、会议和公共活动中,人们都对美国文学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些都表明了这个学科受欢迎的程度和生命力。其生命力还表现在学术界内部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各学术流派之间的激烈辩论之中。几乎所有新近兴起的批评流派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追随者,并且还可以找到其主要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尤其是在近三十年,美国文学作品为越来越多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研究文本或成为其研究重心。其中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为这些研究提供最基本素材源泉的就是美国文学。在关于多元文化争议和社会准则形成方面的研究领域内也是如此。尽管这些问题本身都是超越历史和文化的,但关于这些方面的争论却主要以美国的文学作品为中心。

我们无须详察所有这些文化活动或透彻了解其中任何一种学科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已经促进了多个学科的学术发展。质量方面惊人的差距,行话术语向其他领域的扩散,新潮与流行的交织混合,这些不容忽视的学术发展事实也让我们意识到进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益处。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当前的学术争鸣之中时,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由于美国文学批评的多元争鸣和开放性等特点,它已经成为其他人文科学发展的先驱。出



于同样的原因，美国文学现在成为教学和研究领域里的一片新大陆。除了出版大量新版的美国文学古典名著以外，学者们还在史无前例地开发着一些以前从未被重视的文学体裁。这样一来，我们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美国文学这一名称的含义，其内涵根植在具有不同传统、不同的审美观甚至对文学有不同理解的美国各民族之中。

这些学术发展极大地扩展了美国文学的意义和研究素材。对于新一代的评论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系列恒定的和公认的美国文学名著史了。同时，它的基础也不再仅仅是某一个得到公认的美国文学作品的历史观点。当然，对于研究结论明确化和希望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公认的要求仍然继续存在，但现代批评的边缘化、争鸣性和竞争性等特点，以及不同声音间的对话和不同的解释框架同时存在的这些大气候，明显影响着当代的文学批评。

人们将目前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形看做是人文民主化进程的标志，是市场化或职业化的结果。不论怎么看，这种情形都标志着学术权威结构上的改变。从18世纪开始至今，文学研究一直依赖于对其性质和本质的共识性认识。我们在今天祈求这种共识，听起来像是在呼吁一种妥协或恋旧情怀。曾经在批评与学术之间以及审美与历史分析之间存在的相对明显的界限，如今已经模糊并不断地分化成为一些特殊的学术范畴，比如特殊的专业知识分支、特殊的研究素材、特殊的论证模式及劝说策略等。

简言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文学史的研究包括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活动。这个领域中权威的产生就完全来自于各种互相差别却又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我们姑且称之为差别性的权威存在于批评家对某个群体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存在于他对某类材料的（这些材料都具有各自特别的权威）驾驭能力，也存在于他做的研究所体现出的综合实力。联系性权威指的是用某种研究或解释方法来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质疑、挑战或支持他人观点的能力，是从其他众多或相互补充或相互矛盾的解读模式中提取深刻内涵和本质的能力。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以上两方面都是具有权威性的，它既注重个体，同时也统观全局。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它既从文学本身进行阐述，同时又探索着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这部文学史的视角是多元的，它描述的是美国各类文学形式的综合历史。它也展示了文学界中包括多元文化在内的关于文化模式和文化价值取向的持久争论。因此，各个观点相互对抗这一特点就贯穿了本书的许多章节，而这一点也恰恰符合《剑桥美国文学史》的一贯传统。本书高屋建瓴的治学姿态与道德——以文学分析作为对学术争论、不同视角和相对公正的评判基础——可以从我们借用的浪漫主义时期温和派批评家对“艺术”一词的定义中得到反映。早期对文学